

CHINA

中国 佛教文化 大观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佛教文化大观

方广铝 主 编
袁 坚 副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中国佛教文化大观 / 方广铝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1

(中国文化大观系列)

ISBN 7-301-04542-5

I. 中… II. 方… III. 佛教 - 文化 - 研究 - 中国 IV. B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8733 号

中国文化大观系列

书名: 中国佛教文化大观

著作责任者: 方广铝

责任编辑: 刘方 江溶

标准书号: ISBN 7-301-04542-5/G.587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大学校内 邮编: 100871

网址: <http://cbs.pku.edu.cn/cbs.htm>

电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室 62752022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行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销者: 新华书店

版本记录: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6 开本 42 印张

1685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一版 2001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98 元

中国佛教文化大观

顾 问	任继愈
主 编	方广锡
副主编	袁 坚

编委兼撰稿人

王 尧	王亚荣	王志超	方广锡
业露华	华方田	白 炎	白奉军
许培玲	吕建福	李 申	李 强
李际宁	苏 军	杨照林	张九林
张大柘	张国风	陈 践	陈金华
陈景富	周 炜	柳雪峰	赵怡平
袁 坚	侯 冲	徐文明	徐建华
唐世民	黄夏年	黄春和	黄燕生
葛维钧	超 凡	温玉成	温金玉
	鲍希福	黎 明	

图片摄制 王 镛 李际宁 葛维钧

总序

走向新的世纪

江 溶

一九九〇春

于北京大学寒暑斋

半个世纪前,一位哲人曾忧郁地发问:中国文化之美丽精神往何处去?今日思之,犹怦然心动。国情日新,宇宙恒变,处于当代世界文化大视野中之吾国文化,如何在东西文化之碰撞与融会中铸造崭新生命又永葆其美丽精神,实非等闲之事。

文化者,民族灵魂之光也。雄浑浩茫之文学艺术,博大宽容之哲思气质,生生不息之民族精神,兼收并蓄之文化表象,实乃中华民族灵性之结晶。中国文化品格,重各类学术文化精神之融和,而恒以完美人格之形成和民族文化之弘扬为旨归。故《易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知言在于知人。盖人者,关乎文化精神之消长,民族气运之盛衰也。鉴于此,予以为,文化之根系于人。文化之创造,诚当日新其德,通其变以不倦;月新其视,刚健笃实以辉光。故而,冷峻把玩与审视国宝家珍,重塑华夏审美文化人格,乃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之要旨。为此大计,遂策划有《中国文化大观系列》,奉献给炎黄子孙,朋友同道。

“大观”者,取其繁富多彩、洋洋大观之意也。或窥视字里乾坤,以追溯文明根系之久远;或叩访古迹名胜,以探测文化积淀之丰厚;或遍览岩穴陵寝,以寻觅初民五彩之梦境;或博采艺苑精华,以领悟先哲创造之伟力;或追摄古今,以把握社会历史之脉向;或俯瞰东西,以通晓宇宙人生之底蕴。每卷力臻纵涉古今,横贯史论,汲取学术探究之新论诤识,承接世界文化之八面来风,以穷“有边无边”之理,得“有尽无尽之见”(章太炎语)。《中国文化大观系列》,每卷字百余万,图数百幅,力求视野开阔,见解新鲜,资料丰饶,文笔生动,装帧精美,居较高层次而涉猎中国文化之方方面面,并兼具学术理论、鉴赏收藏与工具书之价值。

大浪淘沙,真情不泯。此大观得以问世,幸赖新老同仁鼎力相助,精诚合作。玉壶冰心,表里澄澈,清贫自守,民族脊骨。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值此世纪将去之际,我等恳祈海内知音,承之以艾,继之以油,同裁吾古国五千载之悠悠霞彩,共织我中华新世纪之灿灿云锦。

是所望焉,谨序。

A GRAND EXPOSITION OF
CHINESE CULTURE SERIES

GENERAL PREFACE

Jiang Rong

Half a century ago a sage full of misgivings asked: "Whither is the fine spirit of Chinese culture going?" When we recall his question today, we feel the same bewilderment. The condition of the country is daily changing, and the world is in a constant flux.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world culture, that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being transformed under the impact of foreign cultures and in the fus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It is a matter of no small importance that our Chinese culture should acquire a new life and yet preserve and develop its fine spirit for good and all.

As to culture, it is the light to the soul of the nation. Sublime and uplifting art and literature, the magnanimous and tolerant philosophical temper, the everlasting national spirit, the all-embracing and eclectic attitude of culture—all this is the ess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ethos. The nature of Chinese culture stresses the fusion of different schools of thought, aiming at the formation of the ideal character and the propaga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Thus says *The Book of Changes*: "The heavens move steadily, and the good man never ceases to perfect himself." Confucius says: "The superior man is affable, but not adulatory; the mean is adulatory, but not affable." Mencius says: "I will build up my manly spirit."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a statement we must know the man who makes it. It is man who affects the growth or decline of the spirit of culture as well as the prosperity or decay of a nation. In view of this, I consider the roots of culture to be found in man. The creation of culture is going on

every day and is ever renewing, showing an infinite variety and aiming at the highest perfection. Consequently we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crutiny and appreciation of the treasures of our culture in an attempt to remould the aesthetic taste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propagate the best heritage of our national culture. Hence the *Grand Exposition Series*, to be presented to people of a Chinese origin as well as friends and colleagues.

"A Grand Exposition" implies the multifarious variety and the all-embracing range of our cultural treasures on exhibition. Some books in this series deal with philological evidence, tracing the origin of our ancient civilization in the early forms of Chinese characters; others are travel books and geographical accounts of cultural sites and scenic spots; still others are descriptions of cave paintings and sculptures and subterranean royal tombs. There are also books of art history, social history, philosophy, and what not. Each volume in the series contains over a million words and more than a hundred illustrations. Each volume presents a broad vista, a fresh approach, and a wealth of material; and each is written in a lively style, and is in an exquisite binding. The series survey all aspects of Chinese culture in an expert way so that they can serve as scholarly works, reference books, collectors' pieces, etc.

The series are made possible by the joint support and united collaboration of our whole staff. We extend to all our heartfelt thanks.

As the present century is drawing near its end, we look expectantly into the future. We sincerely hope that our readers at home and abroad will support our efforts to rejuvenate and glorify the everlasting culture of the Chinese people.

Peking University
Spring, 1990

序 言

佛教 在中国文化 中的地位

任继愈

佛教起源于印度次大陆,传播地区包括今天的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国。后又传播到东南亚的缅甸、泰国等国。传入中国时间约有二千年。说“约有二千年”,是因为宗教的传播不同于某一政治事件,可以有确切的年月和时间。宗教是一种文化形态,而文化传播是渐进的。文化有它的群体性、社会性。宗教的传入须有一段被接收的过程。开始传播时,只有少数人。由少数人的传播到拥有一定数量的信徒,决非一朝一夕的事。因此无法确定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年代为某某年。起码我们目前掌握的史料还无法确定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年代。

佛教传入中国,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条经中亚细亚,传入新疆以至长安、洛阳;一条经尼泊尔传入西藏地区;一条在云南西部边境,经泰国、缅甸接壤地区传入。

这三条途径传入中国的佛教都产生相应的影响,并形成了中国佛教的三个支派。传入黄河流域的一支形成“汉传佛教”,传入西藏地区的一支形成“藏传佛教”,传入云南的一支形成“云南上座部”。由于各地区文化、地域、社会生活的差异,这三大支派发展的形势也有差别。云南上座部人数最少,传播地区局限于云南省西部边沿地带。藏传佛教传播较广,从西藏开始,沿中国西北到内蒙古、外蒙古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产生广泛影响。这两大支派自成体系。汉传佛教这一支派,影响人口数量最大,信徒最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最为深远。

汉传佛教以汉文化为传播载体,以佛典汉文译本及中华佛教撰著系统地介绍了佛教历史、经典、教义。传播地区从黄河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此后又以汉文佛教著译为载体向东部邻国扩散,经过朝鲜半岛东传日本,此外还传播到越南。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有高度文明的大国。它有深厚悠久的历史传统,对外来文化有一种鉴别、择取的能力。所以,佛教传入时并不是很顺利地就被接受。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经历了与佛教的一段长时期的交流、冲撞,才逐渐吸收了其中的适合于中国人的部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中国佛教。这一特点在汉传佛教中表现得最充分。中国藏传佛教及云南上座部佛教也有类似的情况,这里不具论。

中国汉传佛教有二千年历史,从它与中国传

统文化的相互关系看,可大致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译述阶段,从初传入到南北朝,历时约五百年。这时期的重要的佛教代表人物大都是外国译经僧人,他们是佛教典籍传译的主持人。他们的任务是翻译、介绍佛教的基本内容。这一时期的后期也开始出现中国人撰写的佛教著作,但大都是对印度佛教经典的注疏与介绍。由于中华民族有相当高深的文化素养,因此,即使在注疏与介绍中也有所创造。如佛教般若学是佛教理论中的重要流派。中国学者也十分看重般若学,但他们有独特的看法。如“六家七宗”,反映了中国玄学的不同学派对佛教般若学的理解。因此,从某种角度讲,“六家七宗”的出现,也可以看作是中国佛教学者力图摆脱依傍,提出自己解释的一种尝试。

第二阶段是创造发展阶段。历时约三百年。前一阶段佛教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外国僧人,这一阶段佛教的创造发展者几乎都是中国僧人。隋唐以前介绍佛教典籍原著要借重外国僧人。隋唐以后,介绍翻译外国典籍比重减少,因为印度佛教的重要经典大多有了汉译本,有的典籍有两种或多种译本,乃至综合不同译本的编译本。中国人的汉文著作比重急剧增加。内容为中国佛教信徒关于该佛教典籍的理解、阐释。这一时期的作者已由外国佛教学者转移为中国佛教学者。著作的内容也从介绍、转述到阐发、发挥。中国佛教学者继承了中国古代以述为作,以述代作的传统方式,他们的著作名为佛经的注疏,其内容主要是论述著者自己的理论体系。佛教传播中心已转移到中国。中国佛教离开印度佛教词句,注重发挥佛教的微言大义。有些发挥是在印度佛教的某些经典中找到凭借而赋予新意;也有些中国人的著作脱离依傍,完全阐发自己的理论。禅宗的理论在印度就几乎找不到什么根据,他们自称“教外别传”,得自佛祖的“心印”。南北朝中期以后,不断出现“伪经”。这些“伪经”,是当时时代思潮的反映,有很重要的思想史料价值,丰富了中国佛教的内容,开创了中国佛教理论研究的新局面。从人类认识史、文化史角度看,佛教史也等于中国文化史、思想史。

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三阶段是儒、佛、道“三教合一”,也可称为“佛教儒化”阶段。佛教与中国传统宗教儒、道两教进一步结合,潜移默化,深入到中国文化的中枢部分。这一糅合过程,充实、

改造了儒教的世界观,把佛教长期发展的心性之学渗透到理学内部。在佛教心性之学的参与下,中国的儒教逐渐形成。佛教得儒教而广,儒教得佛教而深。三教合一,儒教居中,佛道两教为辅。从此中国的佛教与儒教同命运,共兴衰。学术界一致认为朱子(熹)近道,陆子(九渊)近禅,王守仁(阳明)近狂禅。事实上,没有佛教就没有儒教,以反佛教自命的宋儒,没有不受佛教洗礼的,骨子里是佛教的嫡系传人。

研究佛教文化是研究中华民族文化这个总课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佛教作为一个宗教,它所影响的只是社会上某一部分对佛教具有虔诚的宗教信仰或宗教感情的人;而佛教作为一种文化,它已经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成为笼罩着整个民族精神生活的巨大背景。任何一个在这个背景中生活的中国人,都不可能不受它的影响。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与中国儒教代表人物孔子、道教代表人物老子并称“三圣”。中国各族人民都没有把佛教祖师当成外国人,而且受到普遍的尊敬。由此也可见佛教文化入人心之深广。

多灾多难的二十世纪,中华民族走过艰难的路程。二十世纪后半,我们得到真正的独立自主,开始由积贫积弱走向富强之路。二十一世纪,我们要在前人创造的基础上创建伟大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文化建设是一项继往开来的工程,也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既不可能暴起,也不会暴落。完成这一伟大任务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事业,也是我们共同的历史责任。

温故知新,由旧创新,是发展文化的通例。这部《中国佛教文化大观》从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着眼,论述了佛教文化的种种形态,以及它对中华民族文化影响的种种方面,包括宗教生活、民俗习惯、政治观念、伦理思想、价值观念乃至哲学、文学、艺术、科学、饮食等诸多方面,包罗宏富,科学地、系统地向社会广大读者介绍佛教文化的概貌。编者的态度是认真的,所介绍的资料是可信的,在不少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我相信,这部著作的问世,不仅对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提供了一部可用的资料,也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佛教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研究向前发展。

方广钊和许多编写者的努力和成就值得鼓励。我愿在此书出版之际,向读者推荐这本著作。

前言

中国：佛教的第二故乡

方广锬

—

佛教约于公元前六至公元前五世纪，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释迦牟尼创立。起初，它只是社会上众多的宗教哲学派别之一，仅流行于北印度，主要是恒河中、下游地区。后因受到不少社会人士的欢迎，尤其得到许多国王与富商的支持，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古印度主要的宗教派别之一。

佛教在印度的发展一般分作初期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密教四个时期。从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到部派分裂为初期佛教时期。此时的基本教义主张世界充满各种痛苦，产生痛苦的原因是世人不懂佛法真理，贪耽于种种世俗的欲望与享受，从而使自己在业报规律的驱使下不断轮回；他们认为，只要能够断绝轮回，就能抵达无限圆满幸福的涅槃境地，这就是解脱；为了达到解脱的目的，必须按照佛教的教导采取正确的生活方式与修持方式。当时的教团由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等四种人按照一定的规范组成，均须遵守一定的戒律。但组织比较松散，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约于公元前四世纪左右，佛教产生第一次分裂，形成上座部与大众部两大派，从而进入部派佛教时期。分裂的原因据说是对戒律的见解不同，但也有典籍说是由于对教义的观点不同。其后两大派辗转分裂，不同的典籍记载互异，有分裂为十八派或二十派等说法，但据地下出土的碑铭资料则有二十多派。部派佛教时期，佛教的理论趋于严密化与体系化，各部派大多主张通过戒律、禅定、智慧等三种方式来争取个人的解脱，并把证得阿罗汉果位作为个人解脱的最高形式。公元前一世纪左右，正当部派佛教蓬勃发展的时候，大乘佛教开始在以佛塔崇拜为中心的在家信徒中酝酿产生，并得到不少出家僧人的支持。大乘佛教指责传统的部派佛教只求自我解脱，不讲普度众生，贬之为“小乘”，自称是能够运载更多的人超越生死，抵达涅槃彼岸的“大乘”。他们主张把佛的普度众生的品格作为每个佛教信徒的人格典范，即一个佛教徒首先应当是一个菩萨。然后通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六种方式修持菩萨行，认为这样就可以像释迦牟尼一样成佛，而不仅仅当一个只求自我解脱的阿罗汉。随着大乘佛教理论的深化，先

后出现中观派与瑜伽行派等两大主要派别。密教则产生于公元七世纪,它吸收了印度教与印度民间俗信的许多因素,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轨为其特征,宣扬口诵真言密咒(语密)、手结契印(身密)、心作观想(意密)等三密相应,便可即身成佛。八世纪起,伊斯兰教不断进入南亚次大陆,十一世纪后逐渐成为强大的势力。他们对佛教采取高压政策,到十三世纪初,印度佛教基本消亡。十九世纪以后,由一些反对种姓歧视、反对迫害贱民的人士的提倡,印度佛教有所复兴。

公元前三世纪,印度佛教在孔雀王朝阿育王的支持下,分南传、北传两条路线开始向外传播。南传佛教首先进入斯里兰卡,后逐渐传到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印度尼西亚以及我国云南西双版纳地区,这一派所传的是属于部派佛教系统的斯里兰卡上座部。北传佛教分为两路,一路经由中亚传入我国,又从我国传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一般称为汉传佛教,这一派所传以大乘佛教为主。另一路传入我国西藏,后逐渐流传于我国的藏、蒙、满、裕固、纳西等民族中,并传到不丹、尼泊尔、蒙古人民共和国、俄罗斯等国,一般称为藏传佛教,这一派所传以密教为主。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佛教广泛传播于南亚、东亚、东南亚与中亚,成为一个影响东方世界广大区域与众多人民的世界性的宗教。近代以来并对西欧、北美等世界各地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

世界现存的三大佛教派别在我国均有流传,成为中国佛教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完全是在我国成长起来,并传播到其他各国的,所以不少人把中国称为佛教的第二故乡。两千年前传入的异邦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矛盾、相互吸引、相互冲突、相互融摄。其深入协调的结果,既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面貌,也极大地改变了自己的形态。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外来的印度佛教,逐步演变成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契合的中国佛教,并与儒、道两教一起,成为支撑着中国传统文化之鼎的三根主要支柱。

那么,中国佛教有些什么特点呢?

(一)融摄性。

中国佛教的融摄性反映在两个方面:首先是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融摄,其次是对佛教内部各种思想学说的融摄。

在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方面,正如不少研究者已经指出的,佛教初传时曾有一个依附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阶段。我认为,这里所谓的依附,不应该理解为佛教只是消极地托附于传统文化之下,而应该理解为佛教在有选择地融摄与积极地协调。例如,佛教初传中国,很快找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点——灵魂不死说。其实,印度佛教并不主张人有一个常恒不变的灵魂,与中国传统的元气灵魂说更是格格不入。但为了将轮回业报理论导入中国,他们接过了中国的元气灵魂说。三国时康僧会翻译《六度集经》就称:“魂灵与元气相合,终而复始,轮转无际,信有生死,殃福所趣。”(《大正藏》卷三,第51页)由于他们的努力,使轮回业报观念很快流传开来,达到使人们“观生死报应之际,莫不瞿然自失”(袁宏《后汉纪》)的效果。又如东晋僧人不仅接过魏晋玄学“本无”的命题发展自己的佛教般若空学,甚至仿照当时名士的风度参与清谈,从而扩大了影响。

由于印度佛教本身并不统一,随着历史的发展又出现不同的派别,各种学说歧义颇大。在印度,各不同派别斗争激烈,有时为了某种学说的胜负,甚至以性命相争,斩头相谢。但中国佛教则宁愿采用更为理性的“判教”方式,即力求把传入的各种不同的学说、观点会融在一起,排定其逻辑次序,以求消弭其矛盾,达到高度的和谐。其后中国佛教也出现宗派,但每当各宗派纷争不已的时候,总有人出面从事会融的工作。比如宗密之会融禅、教两派;延寿之主张禅、净双修。

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的产生是绝对的。但中国佛教总有一种力量,力图融摄诸种异质因素,使之趋于和谐。这就是它的融摄性。

(二)创造性。

中国佛教不仅具有融摄教内、外诸种异质因素的能力,并且具有在融摄诸种异质因素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学说或理论,从而把自己提高或推进一步的能力。这是中国佛教能够长时期盛而不衰,保持勃勃生机的重要原因。

例如由于受到种姓制度与激烈的教派斗争的影响,印度佛教虽在理论上有所谓“众生平等”的说法,但在实际的宗教修习中又有“一阐提”(“一阐提”,梵文作“Icchantika”,意为断绝善根)

人能不能成佛的争论。晋宋之际,僧人竺道生在印度《涅槃经》与中国传统“性善论”的影响下,孤明先发,提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即使一阐提人也能成佛。虽然他的观点受到当时部分墨守印度佛教旧说的僧人的反对,本人也被开除出僧团,但最终大家仍都服膺他的新观点。从中国哲学史上看,他的观点把中国哲学从玄学本体论提高到心性论,大大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从此,一切众生都有佛性的观点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后来唐玄奘撤回印度最时髦的“五姓各别”说(印度佛教瑜伽行派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众生的本性都是先天的,不可改变。这种本性将决定诸众生将来或成佛、成辟支佛、成阿罗汉;或永远在三界轮回,不得解脱;或种姓不定),但在中国就是流传不开。

最典型地反映中国佛教的创造性的,是中国式的佛教宗派的出现。例如禅宗虽然以“禅”命名,但他们所谓的“禅”与印度佛教的禅定已经完全是两回事。相当多一批禅宗僧人平时既不读经,又不坐禅,只是直截了当地在建立佛教世界观上下工夫。他们的这种修习方式与印度佛教大相径庭,实际是上承中国儒家的个人修养,下启宋明理学的格物致知,成为中国人修身正心理论与实践的有机一环。正因为禅宗立足于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对印度佛教作了一大创造,所以它成为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佛教宗派。

(三)协调性。

文化是一定社会经济的产物。文化水平有高有低,文化的传播也有一种“势差”现象(这是任继愈先生在《佛教与东方文化》一文中阐述的观点参见《任继愈学术著作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11月第一版,第267—268页)。亦即文化只能由高向低发生影响,不能反过来由低度发展的文化去影响、改造高度发展的文化。中国历史上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即使一时在政治上占支配地位,但最终不得不接受高水平的汉文化的意识形态,就是雄辩的例证。但是,就中印文化交流而言,两大民族的文化水平大体相当,没有明显的势差。因此,佛教在中国,对于能够被自己融摄的中国文化,就尽量融摄之。而对于不可能被自己融摄的内容,则尽量协调之。

在儒、释、道三教鼎立的总格局中,儒家始终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国聪明的统治者都明白,凡是要治国平天下,必须依靠儒家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的伦理纲常。佛教初传中国时,还一直坚持印度佛教沙门不拜君亲的传统。由于这一传统与中国的伦理纲常相冲突,所以不断产生纠纷与争议。最后,佛教终于接受了拜君亲的现实,与中国传统文化取得协调。

如果说,在拜君亲等具体问题上,佛教还做过某些抗争的话,则在与儒家、道教的总体关系上,佛教一直非常清醒地采取协调的立场。如梁武帝虽然尊崇佛教,但又把释迦牟尼、孔子、老子并称“三圣”。晋代著名佛教徒孙绰称:“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应世轨物,盖亦随时。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大正藏》卷五二,第17页上)自觉地立在与孔、周相互补充的地位。这就是后世中国三教合一思想的基础所在。在中国以宗法制为中心的文化结构中,孝道是人的立身之本;而印度佛教本来则不讲孝,只是联系轮回转世来解释亲子关系。但是,为了与中国文化取得协调,中国佛教大力宣扬佛教与孝道的统一,为此甚至不惜编造出大量的伪经。

由于中国佛教具有协调性这种功能,使得佛教能够得到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以利于本身的发展。

(四)适应性。

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人类社会从来分为不同的阶级。不仅如此,相同的阶级及不同阶级的人们之间还结成各种各样的阶层或利益集团。如何最大限度地得到社会各个阶级、阶层以及各利益集团人们的支持,是佛教能够顺利发展的关键。而佛教恰恰具有这种尽量适应社会各个不同层次的人们的不同需要的能力。

中国佛教的构成内涵比较复杂,其中既有比较高深的哲学形态,又有比较粗俗的信仰形态。所以既能满足知识分子玄奥的哲学思辩的要求,又能满足一般民众急功好利的世俗愿望。对在位的帝王将相,它承诺延祚增寿,赐福加禄;对失意的文人骚客,它提供精神的避风港。对有意为善者,它答应来世的幸福;对犯法作科者,它提供赎罪的方法。总之,任何人只要信仰它,就都可以在它那里各取所需,各得其所。从而使得它在社会各阶层中都能得到支持者。

中国佛教为什么会有上述特点?这主要是因受到中国社会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制约与影响。

自秦汉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专

制主义国家。国家权力在中国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也不允许任何力量与它抗衡。在历史上,中国的统治阶级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支持佛教,也曾经因为佛教势力过于庞大而毁释废佛。从总体上看,国家始终制导着佛教,并在佛教的发展中实现着自己的意志。中国佛教的领袖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从而认识到为了佛教自己的利益与发展,必须从各个方面适应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需要。释道安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高僧传·释道安传》)就是上述认识的高度概括。这就决定了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态度与方向。

以家族为中心的宗法制度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儒家思想就是在这一基础上产生,并为维护这一基础服务的。儒家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纲常名教,成为中国社会天经地义的道德规范。在这些道德规范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真正体现封建宗法制度的对“君”的“忠”与对“亲”的“孝”。在忠、孝这两面旗帜面前,中国社会的任何势力都只能匍匐在地,顶礼膜拜,佛教也不例外。这就规定与制约了佛教发展的方向。中国佛教后来建立起将本派学说传承与寺院财产继承相结合的法嗣制度,从而形成中国佛教的宗派,这实际就是世俗社会宗法制度在佛教寺院中的再现。

自古以来,中国基本保持一种大一统的格局。即使在各地政权割据的时代,中国人也认为统一是正常的,而分裂是不正常的。各分裂势力或以统一为己任,或奉某一政权为正朔。与此相表里,中国传统文化也具有一种大一统的品格,这主要反映在中国传统文化既有强大的趋同性与凝聚力,又具有一种恢弘的气魄与博大的胸怀,具有吸收、消化各种外来文化,会融各种不同观点的良好素质,并由此酿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意识。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良好素质与深层意识,使它不但吸收、会融印度佛教成为中国佛教,并使中国佛教的融摄性、协调性相得益彰。

中国佛教的特点及其产生原因是一个大题目,本文限于篇幅,只能略略点题。

三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多元的汇合。在展开中

国传统文化诸元之分析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必须重视佛教的文化品位,从而重视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

佛教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社会文化现象,是两千多年来无数佛教徒社会历史实践的总积淀。作为一种宗教,它有教主、教义、教团,亦即佛教所谓的佛、法、僧等三宝,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发挥着或消极、或积极的作用。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包摄了信仰观念、社会意识、道德规范、文学艺术、心理习俗,从而影响到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佛教在中国流传、发展了两千年,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传统的中国文化之中。人类文化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不能,也不可能完全割断。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我们建设现代化精神文明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批判地继承与发扬我国传统文化中一切优秀的成分。为此,就必须反思过去的一切文化形态与文化遗产,也包括探寻佛教文化在人们传统观念中存在的种种形态,分析佛教文化在人们心灵中积淀的种种影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克服佛教文化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的消极因素,吸取佛教文化中一切有价值、有活力的精华,来充实与发展新时代的中华民族新文化。

7

A GRAND EXPOSITION
OF CHINESE CULTURE SERIES

中国文化大观系列

中国佛教文化大观

方广锡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方广锡

江苏邗江人，1948 年生于上海。

哲学博士。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佛教研究室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
敦煌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佛学院客座教授兼研究生导师。

从事佛教文献学、敦煌学、佛教史及佛教
思想之研究。

主要著作有《佛教大藏经史》、《般若心经译注集成》、

《敦煌学佛教学论丛》、《敦煌佛教

经录辑校》、《佛教志》、《印度禅》、《佛教

典集百问》等十余部。

论文一百余篇。主编《藏外佛教文献》、

《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藏外佛经》等。

国家“八五”、“九五”重点图书

A GRAND EXPOSITION
OF CHINESE CULTURE SERIES

中国文化大观系列

出版总监 彭松建

总策划 江 溶

国家“八五”、“九五”重点图书

7

彭松建 ▶

湖南汨罗人，1941年生。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68年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71年至1979年任职于北京出版社，1980年至今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工作，现任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编审，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兼职教授，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大学出版工作者协会理事长。主要著作有《现代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人口普查与人口分析》、《人口经济学》、《人才与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史》（含合著）。主要译著有《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人口增长经济学》、《人口理论史》、《家庭经济分析》、《图书出版指南》（含合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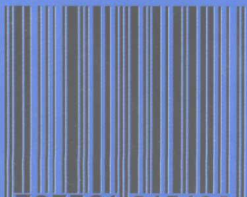


江 溶 ▶

江南通人，1946年生，197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留系任教，1980年调任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史编辑。先后编审学术著作百余种，其中《文艺美学丛书》三十种，《文艺美学精选丛书》十种。现任北京大学出版社编审。负责国家“八五”、“九五”重点图书项目《中国文化大观系列》（十卷本）。撰写和主编著作有《创作例话》、《艺术欣赏指要》、《中国园林艺术概观》、《中外文学书目答问》、《世界文学名著诞生记》、《当代世界美学艺术学辞典》、《治学谈小丛书》等十余种（含合作），发表学术论文和散文、诗歌作品数十篇。



ISBN 7-301-04542-5



9 787301 045428 >

装帧设计：林胜利

ISBN 7-301-04542-5/G·587

定价：98.00 元

目 录

总序	江 溶
序言	任继愈
前言	方广锬

上编 三宝风采

一 横空出世

——纷纷寻源

(一) 姑妄说前史	3
1. 过去七佛	3
2. 释迦先祖	4
(二) 创教功千秋	5
1. 神异降生	5
2. 四门游观	6
3. 悟道成佛	7
4. 初转法轮	8
5. 创教涅槃	9
(三) 迎风初展叶	11
1. 法化迦叶	11
2. 两大弟子	12
3. 释迦比丘	13

4. 妇女出家	13
5. 在家居士	13
6. 教团生活	13
7. 祇园精舍	14
8. 国王造像	14
9. 第一结集	15
(四) 林莽更抽条	16
1. 提婆达多破僧	16
2. 一座之地	17
3. 地狱之囚	17
4. 根本分裂	18
5. 枝末分裂	18
(五) 树大山又重	19
1. 龙树创设大乘教	19
2. 独眼提婆诠释空	19
3. 无著世亲讲唯识	20
4. 清辩肉身待弥勒	20
(六) 密教独一峰	21
1. 密教兴起	21
2. 盛行波罗王朝	22
3. 密教世间相	23
(七) 血火重洗礼	24
1. 野火烧不尽	24
2. 春风吹又生	24

3. 复兴新态势25

二 佛教宇宙 ——佛教世界观

- (一) 时空观念26
1. 数字中的思想26
2. 奇妙的时间26
3. 佛教空间28
- (二) 世界模式30
1. 三界简述30
2. 三界众生31
3. 三千大千世界33
- (三) 劫变理论34
1. 劫之概念34
2. 小中大劫34
3. 劫变动力35
4. 灾变劫数36
5. 世界的形成与毁灭37
- (四) 人类社会39
1. 人类的产生39
2. 社会的诞生41
- (五) 人类终极42
1. 因果业报及其社会作用42
2. 小乘涅槃——灰身灭智44
3. 大乘涅槃——实相无住46

三 佛法东流 ——中国佛教的步伐

- (一) 佛教初传47
1. 传入的时间与路线48
2. 依附黄老之学的阶段49
3. 攀援玄学的阶段53
4. 高僧佛教与民众佛教57
- (二) 迅猛发展58
1. 关河之学的产生与影响58
2. 南方佛教60
3. 北方佛教62
4. 判教与学派66
5. 典籍的传译与讲习68
6. 佛教的民俗化70
- (三) 宗派分立72
1. 三教合一总格局的形成73
2. 诸宗简介76
3. 民众佛教之形态82
4. 藏传佛教前期85
- (四) 趋于衰落88
1. 会昌废佛及其影响89
2. 晚唐、五代佛教91

3. 两宋佛教93
4. 辽代、西夏、金代佛教96
5. 元代佛教98
6. 明清佛教99
7. 藏传佛教后期101
8. 云南上座部佛教104
- (五) 近代佛教106
1. 近代中国佛教简史106
2. 佛教文化事业107
- (六) 现代佛教107
1. 现代中国佛教概述107
2. 中国佛教之研究112

四 星宿灿烂

——佛教高僧谱

- (一) 创业艰难:初传期的高僧117
1. 康僧会117
2. 朱士行118
3. 竺法护119
4. 帛尸梨密多罗120
5. 释道安121
- (二) 高歌猛进:发展期的高僧122
1. 鸠摩罗什122
2. 释慧远124
3. 释法显125
4. 昙无讖126
5. 僧祐127
6. 昙鸾127
- (三) 意气风发:鼎盛期的高僧128
1. 智顗128
2. 信行129
3. 法琳129
4. 玄奘130
5. 义净132
6. 鉴真132
7. 宗密133
- (四) 惨淡经营:衰落期的高僧134
1. 奇祥134
2. 太虚134
3. 弘一135
4. 圆瑛136
- (五) 交辉互映:少数民族高僧136
1. 阿底夏136
2. 米拉日巴137
3. 萨迦·贡噶坚赞137
4. 宗喀巴138
5. 阿旺罗桑嘉措138
6. 嘉木样协巴139